

司法社工在犯罪被害人法律服務的實踐

吳瓊華

壹、前言

隨著時代潮流的演進，社會工作者除了扮演補助弱勢，協助生活重建外，在司法工作上，從重視加害人觀護、冤獄、更生，完全忽略被害人的存在，終於在歷經多起慘痛隨機殺人、兒童虐待、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愈來愈多的被害人及家屬出來吶喊檢警司法體系應更重視被害人的服務過程及參與權利下，出現了國家應依照被害人的需求，在訴訟過程上賦予資訊獲知權、訴訟參與權、家屬或社工陪同開庭及修復式司法的轉介權利等典範轉移。

然而，學校沒有開課教導司法與社會工作的重要聯結，法律專業背景者以訴訟協助自居，社工員沒碰觸過法律問題，遇到司法訴訟就退避三舍，形成法務、社工及被害人三者間在司法社會工作的三角平衡上，法務員沒有留意到整合性服務的重要性；社工員把基本的司法流程、諮

詢或陪同服務全然交給律師；被害人及家屬因為服務不到位，甚至法律程序天平嚴重傾斜而權益受損，最後更恐形成三輸的局面。

法律訴訟程序的完成、司法平等權力的伸張，對於一般人來說都已經陌生難懂，在犯罪被害身心嚴重受創的當下，被害人及其家屬已經慌亂失措，法律協助的需求顯得那麼刻不容緩、急切地重要。此時此刻，司法觀念未能隨時代而轉化，又社工的法律專業不被信任，資源連結效用無法發揮、同理傾聽無法發揮溫暖被害人，良性互動關係無法建立下，那麼，被害者的創傷復原歷程將因此不斷延宕。惡性循環的情況，更促使被害人的權利無法獲得週全的保障。權力的不平等、司法的壓迫和創傷壓力無法紓解，終將讓部分的被害人心存報復、據此為自己討回公道，那麼他就很可能會成為下一個加害人。

貳、司法社工在法律服務的困境

傳統社會中，犯罪被害人的協助相當多元，根據其需求，從經濟的資助、生活的關懷、職業技能的重建、法律訴訟上的協助、心理創傷的復原、補償金的申請……等等。以曾接受協助的被害人及其家屬，八成以上被害人及其家屬，當案件發生時，第一優先需求的皆為法律相關的協助（王寬弘，2010）。法律協助是犯罪被害人最為重視的一個區塊。然而法律協助卻是建構在檢察官為維護國家與公眾利益而對被告執行偵查、起訴；律師為維護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權益而協助完成訴訟流程、伸張正義。相形之下，社會工作人員在犯罪被害人保護中，經常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在該司法領域中，接觸被害人最為密集、工作最是貼近案主全面性的需求。但綜觀現今法律相關規定，卻未賦予社工等同重要的權力，以致於司法社工在專業的執行上，經常面臨無法發揮的命運、也很少被認同其在該領域中專業的角色。不僅司法界不知道如何運用司法社工協助被害人的功能，社工本身也不知道該於何時、何地去施展自己的專業。

因為跨領域的關係，在專業不足、缺乏經驗傳承下，往往讓社工在面臨法律相關議題時避而遠之；再加上部分社會工作者本位主義的作用下，在法律協助、陪同

調解、責任鑑定、傳訊出庭時，自認為社會工作只需要做到案主生活需求的評估、社會資源的媒合，而把法律相關議題完全推託給律師去處理，因此，導致被害人對社會工作者的不信任，甚至不知道社工在司法程序中究竟能帶給被害者何種實質的幫助？在社工與案主合作期間，社工無法貼近案主真正的需求，不僅法律協助的專業功能無法發揮、甚至連社會工作其他的基本服務需求滿足也無法達成。綜合上述各種狀況，主要在於被害者及其家屬對社工專業角色的質疑；其次，在犯罪被害之初，也許經濟造成緊縮；也許身心受到重創，但都不及法律需求對被害人及其家屬來得迫切。畢竟，經濟的困乏，可以來自親友與一般社政單位的挹注；身心受創不是三兩天短時間得以抒緩。特別是司法人員懲凶除惡的本位主義下，被害人的權益與服務更難彰顯。

奠定司法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基礎，除了可以與被害家庭建立專業關係，彼此在合作、信任的工作模式下，滿足被害人法律協助的需求，進而運用司法的專業，在被害者所處的司法環境仍然不平等的現今臺灣社會環境，當案主因為衝擊事件太大產生無力感時，司法社會工作者運用充權的觀點，與案主採取合作模式，瞭解案主的情境脈絡、給予支持、邀約案主參加被害者家屬團體，促使其降低孤立感、增加

同質性成員的經驗分享，使案主覺得自我是有能力的；而社工則扮演教導、諮詢與倡導的角色，藉由案主積極作為的機會，除了媒體的曝光外，聯結資源爭取被害者權益獲得重視、也促使社會大眾重新省思被害者在司法權力地位不平等的窘境，透過社會工作者的倡導，循序漸進地協助、引領被害人伸張司法地位的真正平等。綜上所述，凡此種種不利的大環境下，都是影響社會工作者在服務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時，難以展現法律專業的困境。面對巨大的社會變遷，為了滿足需求，惟有誠如何振宇（2012）所建議，省思並積極互動，（1）省思：「社工是否準備好，養成司法相關知能，足以及在司法場域與法律人一起工作。而司法體系是否也已體認到社會觀感之重要，不再拘泥於傳統司法思緒當中，而願意與社會一起面對挑戰。」

（2）積極互動：「社工涉進去、司法走出來。」

參、犯罪被害人法律服務的實踐

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法律協助模式，在社會工作上需考量訴訟程序的階段與法律的變化，更要隨時注意案家的身心復原狀況，適時適地展現社工專業、媒合跨專業網域的資源，執行的程序區分為開庭前評估與準備、開庭期權倡與陪伴、開庭後修復與轉介。

一、司法社會工作協助的模式

（一）開庭前評估與準備

1. 司法社會工作者的面向

（1）運用社會工作的鋪陳

從案件發生那一刻開始，不管是透過媒體的訊息獲知被害案件及家庭概況、醫療院所社工室轉介、家屬主動上網蒐尋需求服務的機構，各式各樣主動或被動提供服務，再進一步藉由一通主動關懷的電話訪談，瞭解被害家庭所遭遇到的困境，在極短的幾分鐘訪談中，建立被害家屬的信任，進而到府訪視慰問，進行資源盤點，評估家庭資源介入概況、協助整合家庭結構，提供基本的創傷衛教，展開短期、中期、及長期的資源媒合與整併。建立良好的專業關係，家庭支持的工作也自此展開。

（2）法律基本權益的告知

面對刑事、民事訴訟的繁複與冗長，幾乎所有的被害家庭皆無力招架。偶遇有經濟良好、或學識豐富的被害家庭，即使花了數十萬元高額的律師費在協助程序的處理，然而漫長的等待總是煎熬，如果能在一開始就有基本流程的概念，懂得被害人及家屬權益保障為何？往往安心、放心的內在，將幫助被害家庭在往後漫無止盡的等待中，心中可以稍微釋懷。因此，社工需有基本法律案件訴訟流程圖像，透過簡易講解，幫助被害家屬建立初步概念。

法律權益告知則能積極幫助社工確認轉達補償金申請權益，以及繼承辦理的選擇，透過服務表單的操作，被害家屬的權益與被告知權不致於遺漏。其中，被害死亡案件偵查程序前的相驗與解剖程序，總讓家屬誤以為檢察署拖延偵查，又部分因為被害重傷的個案，家屬面對重大手術、遊走各大醫療院所健保病房，在身心受創的情形，茫茫然過著渾渾噩噩的日子下，往往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忘了進行而影響日後求償的權益，更甚者刑事提告逾期或告訴人錯誤者屢屢發生。

(3) 法務工作的協助

3-1 開庭前的準備將影響家屬面對法庭的自信，與能否勇於陳述意見，為自己的權益聲張。故在開庭前，工作人員要先就開庭通知的書類作說明，同時，以法庭的位置、指導家屬從司法人員的制服與顏色去學習判讀，瞭解開庭的結構。

3-2 有關強制險理賠申請、遺產陳報、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被害人綜合信用報告與金融機構債權人清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人身保險業通報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申請表等，皆能讓已經不知所措的家庭減少疲於盲目奔波，也多了份安心，可以從容、專心處理被害人

傷勢復健或辦理殯葬事宜。

(4) 協助訴訟上心理的準備

面對漫長的訴訟，多數的人對此有概念，卻無法具體描述，更何況當自己在無止盡的等待中，眾親友熱心各說各話的建言、司法及保險黃牛的趁機介入、等待期誤以為警察吃案、刑事只傳訊被告而以為檢察官辦案不公……等等錯誤、紛亂的訊息如雪上加霜般，一層又一層覆蓋在法律專業知識不足的家屬身上，讓他們在回到工作崗位或繼續留守等待間徘徊不定。案發初期也需注意到簡易心理衛教說明，提醒家屬除了面對司法程序外，也要留意家庭成員間的創傷與失落。此時，除了急性心理創傷的處遇外，釐清、陪伴，就變成此階段助人者最主要的工作。

2. 陪伴法律諮詢的面向

(1) 協助諮詢與理解司法實務

所有犯罪被害案件的服務受理，皆源於一個刑事犯罪事實，以及未來被告面對自己行為造成他人損害，所應合理給予被害人及其家屬的一個補償。唯有透過專業的律師諮詢，才能有效讓被害家屬信服，也才能減少許多坊間道聽塗說而來的刑期猜測、天價求償金額可以有機會釐清。司法社會工作者可以陪伴進行義務律師的諮詢，既可提供法律協助，還能奠定自己法律專業的基礎。在每次律師諮詢過程中進行陪同，遇有家屬言語表達困難，或因情緒焦躁不安而影響陳述與聆聽時，司法社

工就是律師與家屬間最好的溝通橋樑。透過助人工作者以口語話、重點整理的方式再次釐清與提醒，使法律諮詢的效能因而更為加強，而社工更能掌握被害案件訴訟的期程，以及家屬所遭遇到的困難，蒐集足夠的資訊，進而有機會在服務過程中，修正服務計畫，重新擬定評估與處遇，隨時跟進訴訟進度，也更能貼近被害家屬的需求。

(2) 瞭解刑事判刑、民事求償的合理數推估

刑期多久才合理？何謂合理的民事損害賠償金額？此關乎被害者的年齡、家中受扶養的人口數、支出的醫療費用、以及被害家屬對逝去被害人的情感投入。沒有絕對合理數，因為再多的金錢也接不回殘缺的身體，再多的賠償金也換不回已經逝世的被害人。透過社工對被害家庭的理解與資訊整合，協助向義務律師徵詢、計算一個符合法院判決實務，且合情合理的民事求償金額，家屬據此進行調解或損害求償訴訟，則可減少法官在調解過程中的困難，藉由合理數的推估，也減去不合理期待後的傷害。

3. 特殊情境的協助

(1) 案件進程遲滯

案件類型百百種，遇到的檢察官或法官特質也不盡相同。在開庭前可能因為證據收集困難、承辦人職務異動、聲請解剖、移送鑑定……等種種理由，而使得刑

事偵查或犯罪被害補償金的審理遲遲未下文，司法社工透過網絡的連結，與司法機關的溝通協調，或明白要向法醫室查詢解剖進度、又如簡易書狀的查詢或協助撰寫，大多能使家屬因此更為安心，也能藉此讓司法社會工作有更積極的作為。

(2) 提告錯誤的即時變更

過失重傷害案件的告訴期僅有六個月，雖然大多數的被害家屬多會及時提告，但也常有因為聚焦於重癱臥床的個案，而導致遲未提告的情形，或重傷植物人家屬，礙於長輩年邁無能力處理，而由無告訴權的子女提告，或未遺有親友得以獨立提告，又未聲請檢察官指定代行告訴的狀況時有產生，此時社工的緊急協處，將被害人及其家屬權益作即時確保與更正就顯得相當重要。

(3) 協助及時聲請相驗

很多因犯罪被害重傷的個案，因為醫療救治困難，或輾轉出入院於各大醫院之間，然因傷重不治或併發感染死亡，如因轉院，或更換醫生，導致個案傷重不治時，醫生不察前因後果，僅以最後併發症病因開立死亡證明，未能及時通報檢察官相驗。如此將導致刑事責任因果關係無法連貫，保險無法獲得理賠，或導致民事求償無門的窘境。因此，司法社工在重傷案件服務初期，必須有高度敏感，同時要隨時掌握重傷個案的動態醫療狀況，才能阻止憾事發生。

（二）開庭期權倡與陪伴

1. 司法社會工作者的面向

（1）開庭前後的情緒支持與陪伴

面對身體的殘缺或是逝去親密家人的悲慟，要說真能理性去看待訴訟，或以不批判的心態去面對被告，實在也太過於為難被害人及其家屬了。面對冷冰冰的訴訟程序，以及維護法庭秩序的理智法官，每一次的開庭，都是一段艱辛的歷程。開庭前的焦慮不安、憤怒的情緒、止不住的哀慟，如果沒有理智去支撐，沒有親友的支持陪伴，這關肯定是二度受創的經驗。因此，社工在評估案家的資源與支持系統不足時，針對特殊案件家屬就應經專業評估進行陪同。特別是遇有家屬表明當庭要勘驗證據及錄影畫面時，即使公務再繁忙都必須抽身陪同。從實務的經驗中，總是發現被害家屬想要釐清真相，卻又容易在知道真相的過程中身心再度受創。於是，當下評估家屬知道真相是否挺得住？而讓他們繼續留在法庭內，或是婉言規勸、協助攙扶他們暫時迴避畫面、離開法庭，也成為司法社會工作者面對法庭秩序即時應變的挑戰。整合實務服務的經驗，需要開庭陪同的指標，大概有三個面向：

1-1 資源與支持系統不足

1-2 出庭表達與陳述有困難

1-3 特殊狀況，如情緒不穩定、勘驗證據、與被告對質……等

（2）接受法官指揮協處或答詢補償金請領

在法庭上，往往家屬會因為懼於法官的權威，因為對法律知識不足，或個人身心受創而無法具體陳述，也或有情緒失控的情形，而法官為了維護開庭的順暢，或法庭的秩序，即使是被害人要維護自身權益而欲聆聽全場審理程序，但都會因為未能遵守相關規定，或因為躁動、過度悲憤而影響到開庭，因而遭到法警勸退或驅離的也所在不少。此時，透過社工的陪伴與指導，家屬才能順利接受答詢。經常遇到無法即時反應的時刻，法官也會當場徵詢司法社工予以協處或立即簽署委任，讓社工協助答詢案家的概況，以及回答事關民事損害賠償的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與請領。如此的作為，及時解決家屬的困難，又能有效建構司法社會工作的專業網絡連結。

（3）審判程序的有效轉述或因應

司法人員慣常以法律專業用語來審理或直接向被害家屬訊問，常常導致被害家屬答非所問，或因礙於權威恐懼而隨便回答。此舉往往造成日後在個人權益的受損。如有些家屬希望將複雜的法律訴訟程序交由檢察官或法官以獨立、專業的客觀態度來審理，但答詢時卻經常以為檢察官及法官會主動懲處被告，故往往以「沒有要提告」來作結。日後發現無權再議，或不能上訴時，才發現因為不懂法律用語而

嚴重影響未來的作為。此時，工作人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雖未必在法庭上代替發聲，但庭上或庭後的指導，對家屬來說則是相當專業又即時的支持。

(4) 生活重建的展開：生理、心理、社會

訴訟的過程中，工作人員在生活重建的協處已經展開。在一次又一次的開庭奔波，幫助被害人及其家屬面對實務現況，同時在為被害人釐清真相、尋求公平正義的過程中，也開始去面對自己的殘缺與失落。社工必須敏感到重傷個案與喪親家庭成員的生理、心理及社會的需求，除了引進治療師把握重傷者的六個月黃金復原期，給予照護的補助與專業的支持；而正常化去看待悲傷歷程，轉介諮商師在喪親者的創傷後壓力症（PTSD）中提供專業輔導，這些都是支撐被害家庭成員可以不斷去接受開庭挑戰的重要支持。

2. 網絡連結與協助

(1) 司法社會工作者與律師的合作

在開庭期間，除了符合法律扶助條件，由機構委派或補助的律師直接提供諮詢、撰狀及訴訟代理等服務外，因訴訟期程漫長，案件屢有變化，再加上被害家屬的情緒議題干擾，往往會使得開庭前後的準備與溝通變得相當重要。此時，司法社工即扮演吃重的角色，絕不是將案件委任給合作的義務律師，即完全將任務轉移或卸除。一個專業的律師當然對訴訟程序的

掌握與進行有絕對的把握，然對於被害家庭的概況、家庭成員心理受創的程度……等，自然沒有個管工作者來得清楚。社工透過訴訟期程的跟進，必要時的陪同諮詢與出庭，一次又一次的溝通瞭解，串起被害家屬與受託律師之間專業關係的溝通橋樑。此舉不只讓工作人員隨時可以掌握訴訟的脈動，也能讓家屬深刻感受到所謂的法律協助不僅僅是冷冰冰的訴訟補助，而是有溫度、符合被害家屬期待的司法過程。

其中，在重傷個案的法律扶助下，工作人員與律師的連結及協助更顯得重要。因為犯罪被害重傷的個案，非截肢、即切除器官，又有多數是癱瘓臥床智能受損者。隨著訴訟進程的發展，個案的傷勢變化極大，甚有因此傷重不治而往生者。此時，因為社工的密集協助或認輔志工的不間斷關懷，才能將個案的最新狀況轉達予協辦的律師知悉，也才能在訴訟的程序上做即時的變更。

(2) 司法社會工作者與諮商師的轉銜

因為開庭，也展開被害家屬與被告，以及與犯罪被害事實真相的不斷碰觸。家屬的情緒隨著開庭而起伏，此時社工應關注開庭日期，在開庭前後密集關懷，才能在家屬最悲傷失落時，即時出現援助或提供情緒支持。透過悲傷情緒的釐清，以及為將來纏訟期間可以堅持下去的理由，家屬多能接受建議，接受諮商輔導來面對自

己的傷痛，也幫助自己有更多動力可以在訴訟期間支撐下去。然而，悲傷的復原歷程是段漫漫長路，過程也絕非一路回穩。特別在案發六個月後，關心的親友漸漸離散，或是年節、生日、忌日等重要的日子，在開庭前後更是嚴重衝擊到被害家屬原來已漸漸平穩的情緒。其情緒波動之大，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的現象，有時也會讓家屬因而癱軟無力出庭，甚至挫敗萌生了結生命的想法。此際，社工除了適時將家屬轉介諮商輔導外，也必須瞭解諮商輔導的進展，深入評估家屬為開庭儲備的能量是否足夠？又何時該有更多的資源進場？如督導老師提供建議，或是邀請諮商師陪同開庭……等。

3. 特殊情境的協助

(1) 特別案件的隔離開庭

犯罪被害案件畢竟不同於一般案件類型，特別在案件本身又涉及家暴、性侵或殺人等。不只被害人本身，連被害家屬都會有感於脅迫，日子過得坐如針氈。當遇到必須出庭，或想為被害人及家人伸張正義時，如何能克服恐懼與害怕勇敢出庭，此時，適時提醒或協助家屬申請隔離訊問或開庭，不僅維持訴訟程序順利進行，同時也在細緻的服務過程中，保護了被害人及其家屬。在實務服務案例中發現，雖然並非是當事人被家暴或性侵害的案件，即使是為被害家屬出庭的身心安全做足準備，都可能是他們在未來人生道路走得平

穩的一項重要工作。

(2) 司法社會工作者在法庭事前的溝通

刑、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主宰於高高在上的法官，但法官也是有血有淚的平凡人。在檢察官與律師，或律師與律師攻防之間，法庭上的審訊、交互詰問、證據的勘驗……等，不只一次次再度提醒犯罪被害事實發生的不可逆性。對於無法再尋找回來的健康身心、不可能死而復生的被害人，在庭訊過程中的艱熬可以想見一般，更何況已經因為犯罪被害事件造成身心受創，或是未經社會歷練的未成年目睹兒，對他們來說，出庭是項重大的挑戰。然而，釐清真相、為被害人聲張正義、為自己完成未竟事宜，都是讓被害家屬即使遭遇荊棘，都要勇敢面對的動力。實務社會矚目案例中，當社工發現死亡的被害人是青少年在臺唯一的親人，一個身心受創嚴重，又目睹凶案血淋淋現場的未成年案子，欲尋求真相、想要親身站上法庭，一一見證司法的審判過程，透過與律師的溝通協調，陳報案子身心狀況與感受給法官知悉，令人雀躍的事，是仁慈法官的悲天憫人，在審理期間細心、貼心地處理訊問、勘驗證據的部分迴避，凶案過程的簡述，凡此種種，皆足以說明，柔性司法確實已經存在。但法官無法知悉細節，律師未能得知家屬的深層內在，社工透過訪視、會談，以及與學校的共同合作下，專

業的服務與網絡的合作，更顯得重要且缺一不可。

（三）開庭後修復與轉介

就被害人保護工作而言，無論是社會工作的展開，或是法律訴訟程序的協助，種種專業的介入，無非都是為被害人及其家屬將已經生活失序，存在意義茫然的日子，奠基一個未來復歸社會的基礎。司法社會工作的介入只是一段時期的陪伴，終歸要放手讓他們前進，而在許未來一個更好的願景前，修復情感、重塑人際關係，都是心靈遭受重創的他們，必然要面對的課題。司法社會工作者不僅在社會工作與法律上要施力作為，在情感的修復與陪伴，更緊緊關係被害家屬心理復原的歷程能否走得穩健、踏實。隨著開庭、和解或是訴訟告一段落，網絡的持續緊密合作、連結同質性被害家庭的支持、以及服務告一段落，完整的結案評估與轉介，如同訴訟進行中的各項處遇一樣重要。此階段的工作內容分述如下：

1. 跨專業網絡的聯合充權

訴訟告一段落僅僅代表法律程序的結束，不代表司法社會工作也必然跟著結案。在被害人及其家屬為自己的案件努力奮鬥之餘，往往在過程中只聚焦在官司的進行，有意無意去忽略個人的感受。如果在過程中，未能一邊在艱熬難纏的訴訟程序中也進行受創心靈的修復，則最後階段

必然是跌落更深不見谷底的深淵，原來支撐著一個空盪飄搖軀體的訴訟進行，隨著判決確定，反倒變成家屬失去活下去動力，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個人受創情感的修復，或是人際退縮的重建等，此時修復式司法的適時引介，有時候也可幫助被害家屬釐清困惑，幫助修復對社會與人際的不信任。

2. 情緒及實務的支持與陪伴

在外人眼中，訴訟結束似乎代表著一切都將回歸失序狀態前了。然而，失去了訴訟的動力，往往也是喪親哀慟療傷的起始點而已。開始可以全然關注個人的情緒，喪親的失落，或意識到判決卻拿不到賠償金的無奈..等。種種不如意的衝擊，帶給被害人及其家屬許多的傷痛。然而因為案件發生已經有段時日，傷痛感會被自己所否定，談起傷心往事也會被家人及親友制止。此時期的繼續傾聽、陪伴及支持，如開庭後的支持，肯定願意出庭面對的勇氣，往往是司法社工有別於其他人所能繼續提供的專業。隨著案件的結束，開辦的家屬團體、年節關懷、生活重建課程等，這才正是被害人或家屬願意真正投注心力的時候，而透過課程或團體的舉辦，篩檢出延遲性創傷的個案接受諮商治療，這些工作往往會因為案發日久而遭人遺忘！

3. 轉介或結案

所有服務的案件終有需結案的一天，

在訴訟結束、心靈修復、生活重建之後，專業評估的轉介或結案是必須的。能有效轉銜司法社會工作後端工作的社福單位極微之少。所以，司法社會工作者要幫助被害人及其家屬整理好情緒，重建家庭健康模式，就必須在最後結案前做好盤點與整頓。不同於一般社會工作的短期服務，在漫漫訴訟陪伴期程後，家屬容易產生依賴，而社工也有可能反移情捨不得結案，此時專業的知能與評估，督導的協助，在適當的時機，做一個完美的結束，將為被害人的創傷事件進行一個完善的療傷止痛清創，幫助他們好好的復歸生活常模，屆時司法社會工作者的任務才算完成。

二、社工在司法體系中培力的困難

如同曾華源、白倩如（2009）在司法與社會工作實務乙文當中所提，當今的司法社會工作在建構與實務執行上，仍然遭遇很多的困難，除了基本屬性的不同、服務期程的漫長、跨專業網絡的合作……等種種困難外，司法社會工作者的培力與養成尚面臨以下幾個困境：

- （一）缺乏系列化專業教學與實務傳承，專業累積困難：社會工作者未能充實法律素養，學校課程中專業學程太少，實務經驗累積費力耗時，人員流動專業傳承不易。
- （二）服務範疇太廣與專業工作者太少：服務跨專業網域太廣，司法社工太

少，服務量能受限、陪同出庭指標未結構化。

- （三）多元角色，專業未被看見：司法社工是各專業領域中的邊緣弱勢，需反思自己的專業角色與定位，主動出擊。（沈慶鴻，2009）

- （四）跨專業網絡溝通轉銜的阻滯：服務未被納入司法體系、社政體系、衛生體系的正式網絡，獨力奮戰十分艱難。（許珍維，2012；何振宇，2012）

肆、結論

在典範轉移的過程中，可能需歷經許多辛酸血淚故事漸漸堆積而成，制度上與法條上建構對被害人友善的司法環境，這並不代表他們能立即享有與加害人同等的對待，讓資訊獲知、訴訟參與、社工陪同、及修復式司法……等，變成他們的權利而不再只是口號。此時，司法社會工作者的適時介入，幫助被害人獲得應有的尊重與權利，過程中，社工的法律專業，勇敢而堅定的角色，為犯罪被害者權利及司法社工專業角色倡議的定位，都再再影響者法律服務的成效。更甚者，期待未來達到天平上真正的平等，讓法律人有更柔軟溫暖的心與具備法律專業的助人社工合作無間，去幫助司法社會工作跨多專業網絡的整合與平衡，尤其需注重司法社工人

員的專業養成與實務的傳承。透過個人紮實的不間斷學習，累積實務陪同的經驗，督導及個案研討的成長，都是奠定實力的基本功課，也是涉入司法領域的必要裝備。

司法社會工作基本就跨足法律與社會工作兩門基本專業，在柔性與剛性之間，在依法處事與貼近家屬需求之間，司法社工自己本身又如何取得平衡？在執行業務的過程中如何與法律人有良善的溝通？再再都考驗著第一線服務的社工人員。敞開心房，接受不同專業的整合性服務，如同何振宇（2012）所建議，省思並積極互動，（1）省思：「社工是否準備好，養成司法相關知能，足以在司法場域與法律

人一起工作。而司法體系是否也已體認到社會觀感之重要，不再拘泥於傳統司法思緒當中，而願意與社會一起面對挑戰。」

（2）積極互動：「社工涉進去、司法走出來。」讓兩個專業融合，一起面對司法社會工作的新領域。而個人更深深覺得，克服社工自身的框架，面對司法霸權，讓社工對自我的專業有自信，實踐為被害家屬倡議的職責，然後，司法社工在犯罪被害人法律服務的實踐才能真正落實。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主任）

關鍵詞：司法社會工作、法律服務、以被害人為中心

📖 參考文獻

-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2013/5/22修正。
- 王寬弘（2010）。〈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執行成效之研究——以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保護對象為例〉。「2010年臺灣人口學會年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
- 何振宇（2012）。〈天平下的「相對公平」：法院之家事調解服務的社會工作處遇初探——以「任務中心」模式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37。頁175-187。
- 沈慶鴻（2009）。〈弱勢社工服務弱勢案主——婚暴社工實務困境之研究〉，《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2）。頁72-142。
- 吳瓊華（2015）。《在犯罪被害人服務中實踐法律社會工作：一段法律人與自我內在相遇的敘說》。彰化：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論文。
- 許珍維（2012）。《司法場域中社會工作者個案倡導之策略與影響因素：以「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為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曾華源、白倩如（2009）。〈司法與社會工作實務〉，《社區發展季刊》128。頁31-48。
- 曾華源、鄭維瑄、吳慧菁、簡美華、白倩如（2013）。《社會個案工作》，臺北：洪葉。

法務部（2012）。〈國家發展計畫（102至105年度）——中程施政計畫篇〉。「行政院第3311次會議」。2012/8/23。

法務部（2012）。《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體檢報告》。臺北：法務部。

法務部（2012）。《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生活需求調查報告》。臺北：法務部。